

新詩歌的發展問題

第二集

《詩刊》編輯部編



新詩歌的發展問題

第二集

《詩刊》編輯部編

作家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・北京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57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

*

字数 179,000 开本 $787 \times 1092 \frac{1}{32}$ 印张 $10 \frac{3}{8}$ 插页 4

1959年9月北京第1版 195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10,000册

編輯說明

一、自我們編印了《新詩歌的發展問題》第一集之後，詩歌問題的討論，繼續展開，盛況空前。今年元旦以來，全國各報刊都發表了文章，很廣泛的包括了各方面的意見，有詩人、作家、批評家、教育家及各界人士和工農兵群眾，參加的人數之多，爭論之熱烈，是我國詩歌史上所沒有的。目前討論還在繼續深入。我們將今年一月至二月各主要報刊上所發表的文章，編成這個第二集，以供讀者參考。

二、本集大體上按發表文章的報刊來排列，同一報刊的文章，又按發表的先後和所爭論的問題擺在一塊，以便讀者了解論爭的發展情況。

三、各地方報刊和大專學校的學報上，也發表了不少文章，限于資料，沒有看到的還有很多，不及一一選載。

四、我們準備將今年三月一日以後的文章，續編成第三集。

《詩刊》編輯部 1959年4月28日

目 次

就当前詩歌中的主要問題答《詩刊》社問	郭沫若 (1)
坐地、巡天及其他	郭沫若 (16)
从工人詩歌看詩歌的民族形式問題	張光年 (19)
民歌与新詩	臧克家 (32)
民歌为新詩开辟了道路	田 間 (39)
关于詩歌的发展問題	卞之琳 (45)
新民歌是主流,詩歌的发展应当以民歌体 为主要基础	宋 垚 (57)
詩歌問題座談会繼續举行	《人民日报》的《編后》 (61)
在新事物面前	
——就新民歌和新詩問題和何其芳同志、 卞之琳同志商榷	張光年 (63)
詩歌問題的百家爭鳴	黎 青 (79)
民歌体有限制嗎?	余树森 (82)
民歌体形式有无限制?	
——評《民歌体有限制嗎?》一文	陆若水 (91)
民歌体的局限性	
——群众創作漫談	唐 弢 (98)

談格律	唐 弢 (102)
民歌——新詩的道路	趙景深 (105)
談談民歌的過去未來	傅東華 (109)
如何對待新民歌與新詩	
——與傅東華先生商榷	張鍾仁 汪國璠 (112)
民歌萬歲!	竇功亞 (116)
我們對新詩和民歌的看法	張 汾 黃 牧 (121)
新詩是“洋詩”嗎?	
——駁《民歌萬歲!》中的錯誤論點	方 牧 (126)
駁“內容論”	天 鷹 (131)
談談形式問題	
——與天鷹同志商榷	唐再興 鄭乃斌 (136)
風格·形式·內容	方歌今 (139)
發展民歌新形式的一個途徑	方 楫 (143)
不僅是對待詩歌形式的態度	宋 堃 (147)
建立真正的現代格律詩	宋 堃 (153)
也談詩的形式問題	
——和沙鷗同志商榷	崔宗理 (164)
《萌芽》關於詩歌發展方向筆談	
也談詩歌的發展方向	王金源 (170)
農民談新民歌	藍 翔 (171)
民歌有沒有“局限性”?	黃亦波 (174)
踏踏實實地向民歌學習	雷 霆 (176)
我的看法	
——致黎汝清同志	宮 璽 (179)

應該正确評價“五四”以來的新詩	何鎮邦 (182)
《星星》筆談新詩的道路	
新詩怎樣在民歌和古典詩詞歌曲的	
基礎上發展	繆 錢 (186)
關於新詩創作問題	劉開揚 (194)
對《新詩的道路問題》一文的幾點淺見	愚 公 (198)
把新詩交給勞動人民	韓 郁 (202)
新民歌——詩歌發展的基礎	黃茂宏 (207)
新詩歌為什麼必須要以民族詩歌為基礎	天 鷹 (211)
道路寬闊，百花爭艷	沙 鷗 (219)
關於詩歌形式問題的爭論	何其芳 (234)
談民歌體	徐 迅 (281)
詩國上的百花齊放	力 揚 (289)
關於新詩的形式問題	馮 至 (304)
漫談文學的民族形式	茅 盾 (314)

就当前詩歌中的主要問題 答《詩刊》社問

郭沫若

一 新民歌是否当前詩歌运动的主流？

这里說的新民歌，我想主要是指大跃进以来所出現的歌謠。对于这个問題，一般的討論偏重于形式方面。目前新民歌的形式，比較接近于旧形式，基本上以七言的為多，特別是农村中的民歌。由工厂来的民歌又稍为不同一点。

我觉得我們最好还是不要从形式上来了解。人民文化水平在不断提高，許多人民公社、工厂都在办中学、大学，工农群众要受高等教育，再加知識分子也經過劳动鍛炼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界綫将逐步消除。这样一来，詩歌的形式也可能会发生变化。所以最好不要偏重在固定的形式上談問題。事实上，中国几千年来的詩歌形式都在变，由四言到五言，到七言，到长短句。旧时代的生产力沒有解放，所以任何变化都显得迂緩。特別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停滯了两千多年，生产的发展和文化的提高都特別慢。今天的情况已完全不同，一天等于二十年，所以今天的民歌形式是这样，明天的形式又是怎样，我們很

难断定。内容决定形式，工农文化水平提高了，生活习惯必然会有所改变，难道诗歌的形式就不会改变？我认为，今天新民歌的精神是主流。新民歌都是从生产和劳动实践出发的，它表现了劳动人民的革命乐观主义和共产主义风格，这种精神和气概，应该说是新民歌的核心。它不仅是今天的主流，同时也是今后的主流。至于所以采取了今天这样的形式，则和农民多少年来的习惯有关。今天农民在住家、穿衣等方面的习惯都没有改，他们表现出来的文艺形式也没有多大的改变，但不能因此断定将来就不改。相反的，根据以往几千年来诗歌发展的历史，根据当前社会跃进的情况，可以断定今后诗歌的形式会改变。

这里顺便提一点往事。前几年一般文艺界的朋友，就是藐视旧诗词和旧形式，近年来毛主席的诗词发表了，大家的认识才不同了。记得我在《诗刊》酝酿期中就提过意见，建议你们不要偏，对旧的形式要一律看待。过去凡是民歌民谣等旧的东西一概被排斥，认为不能登大雅之堂。我过去闹闹旧诗是挨过骂的，有时候不敢发表旧诗，在编集子时把旧诗都剔出来成为“集外”。我们的洋气太盛，看不起土东西，这是五四以来形成的一种风气，可以说受了买办阶级思想的影响。近年来我们回过头来肯定了旧诗词的价值，肯定了民歌民谣的价值，这是好现象。在旧诗词和民歌民谣中，确实有不少东西值得新诗人学习。随着人民文化的提高，这两种东西打成一片后，

我看，是会有新的形式出現的。

毛主席在給克家同志的信上这样說：“詩当然应以新詩为主体，旧詩可以写一些，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，因为这种体裁束縛思想，又不易学”。我認为这样說是很公平的。当然，新詩也有各种各样的新詩，五四以来的新詩，有豆腐干的形式，有梯子坎的形式，有一字一行的形式，有十四行的形式……，有些所謂新詩虽然摆脱了中国旧詩的規律，而套上了西洋旧詩的枷鎖。所以主席說的“以新詩为主体”这句话，恐怕要作一番解释。主席所說的“新詩”大概是摆脱了旧詩詞的謹严格律的自由詩，或者說純任天籟的詩。按我的想法，和旧詩对照起来說，自由詩是比較自由一些。旧詩，特别是律詩和詞，在音韵平仄上是非常严格的；民歌民謠，虽然接近旧形式，但音韵方面也比較自由。好些新詩人学写旧詩詞，使人感到有点不入調。主席說的旧詩詞，就是指格律比較严的东西，那种东西实在不大好搞，象我这样是从五六岁搞起的，搞到現在六十七岁了，有的时候还要脫韵。主席这样提，主要还是着重在詩律可以比較自由一点。不过無論新詩或旧詩，精神必須是今天的，是革命的，这个东西是主流。就說旧詩，也有各种各样的旧詩，有些人的旧詩，那是不敢来登我們的大雅之堂的。民歌的形式将来会变，我們主张多样化。五四以来的自由詩，只要不是很别扭的二十几个字一句，只要不是美国式或英国式的，而是中国式的，我看还是可以繼續下去。陈毅同志有时写很严格的

旧体詩，有时也写自由詩。昨天报上发表的《参观‘蚂蚁啃骨头’》就是自由詩。这对五四以来的詩人岂不是可以长长志气！总之，不要把形式問題看得太重，主要是精神和內容，要以最合适的形式来配合它。自由詩只要能表达今天的精神，还是会被公平的眼光肯定的。所以与其說新民歌是詩歌运动的主流，不如說新民歌的精神是詩歌运动的主流，因为是否主流，不决定于形式。

現在新詩人把过去輕視旧詩詞和民間歌謠的偏向糾正了，在糾正过程中，經過一段辯証的統一，可能新詩的形式会变更，民歌民謠的形式也会变更。拿七言体來說，正式出現于曹丕的詩中，但它真正流行起来还是唐朝，到現在已經一千多年，也就是說七言体統治了詩歌一千多年。我們希望有一种更好的形式出来。

在今天的新歌中，虽然已經可以看出有些不同的調子，不純粹是七言。但如果認為七言的新民歌較多是一时的現象，那也是不恰当的。它的形式不是一时的，而是已經統治了一千多年了，今后很可能不是一千年，甚至还有一万年的生命。比如《詩經》时代的四言詩，到現在已經有三千年了，但只要你高明的話，你今天还是可以运用。所以我們决不能藐視新民歌的形式，而要特別重視新民歌，从精神上学习它，也要从形式上学习它。精神是不断发展、不断革命的，形式也是不断发展、不断革命的。

二 新民歌有无局限性？

这个问题应该肯定一下。我的看法，新民歌是有些局限性的。事实上，任何东西都有它的局限性。

由于时代和生活的改变，我们的词汇也在改变，长的词汇多起来了。如“无产阶级专政”、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、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”、“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”等，从六个字写到十一个字，都是一个词。古时候大体上是一个字一个词，多则两三个字一个词，所以那个时代四言、五言、七言是比较容易适应的。到后来就不同了，假如一个词超过五个字，四言诗就不能解决。有个右派分子闹过一个笑话，他在填词时要用“苏伊士运河”这个词，但在那个地方受了填词字数的限制，只许用四个字，他就把“苏”字砍去，成了“伊士运河”。就如苏东坡先生可称东坡先生一样，好象苏伊士运河也姓苏。这种办法太不高明了，即使要砍，砍“运”字比砍“苏”字还好一点。我们肯定新民歌有它的局限性，但真正有本事的人，他能够在局限中运用得很灵活。

今天的新民歌，特别是农村中来的东西，一般说来比较接近于旧形式。其实，应该反过来说，旧形式是从民歌中产生的。比如七言诗，刚才说正式出现于曹丕的诗中，其实并不是曹丕或其他什么诗人创造出来的，最初是出现在民谣中。象《后汉书》上有些民谣和谚语多有七言的，

又如新莽和东汉制造的銅鏡背面的銘文也多有七言的，甚至有不少《七言鏡》，一开始就說“七言之紀自鏡始”。这些都是无名作家的作品，或汉代工人們的作品。所以七言詩是从民間来的。其所以然，也是因为生活发展的結果。生活发展了，語言发展了，原来四个字五个字一句的局限性增加了，所以在汉代就开始創造七言的句子。一般說，民間的东西总是跑在文人的前面。专业文人直到三国时的曹丕才用七言体来写《燕歌行》，而且只有这么两首。当时的曹氏父子、建安七子等的詩基本上都是五言的，甚至于还有四言的。到了唐朝七言才成为主流，民間的东西跑在前面很久。所以与其說民歌接近旧形式，不如說旧形式是从民歌中产生出来更恰当。

今天的新民歌是在发展的，可能人民当中会創造一些新形式出来，到时候我們又要学习了。現在工人的詩和农民的詩就大不相同，这是因为他們接触的事物和生活习惯有些不同，所以他們的作品的調子也不同。将来农村工厂化，城乡差別消灭了，工农差別消灭了，特别是我們知識分子和工农的差別打消以后，那是会来一个大变化的，会有一个更自由的形式出来。詩本身的发展也是这样。当七言体成了固定的形式以后，民間的东西还是在打破它的局限，这就是用长短句，比如旧剧的唱詞就爱采用“三三四”的調子。“我本是，臥龍崗，散淡的人”，这就是“三三四”的調子。七言体固定了以后，民間和文人还是在想办法突破它，可見它还是有局限性的，說新民

歌毫无局限性是不符事实的。

听起来好像是矛盾的，我觉得新民歌的好处就在它的有局限性，作者能在局限中表现得恰到好处，妙就妙在这里。这就是“又有纪律，又有自由”。本来，自由这个东西是在规律中的自由，如果是无规律的散漫的不羁之马之类的东西，那就不是自由而是放纵。事实上即使是放纵的诗，也还是有它的韵律的，你不能随便拿一篇散文来分行写就称它是诗，人家是不同意的。作为诗，总是有诗的性质在里面的。

三 中国新诗在什么基础上发展？

前面说过，对于这样的问题，大家的争论偏重于形式，我的看法不要偏重于形式。我很早就说过：形式不在乎新旧，主要是内容问题。用旧形式装上新内容，我们不能不承认它是新东西；反过来，象徐志摩那样的东西我们能说它是新的吗？所以，对于新诗发展的基础，不应该从形式上去追求，而应该从劳动实践上，从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打成一片上去阐发。内容总是占领导地位的，政治第一，这是铁定不移的。有一定的内容，就会产生一定的形式。从前我们做新诗的人是垄断的，瞧不起旧形式，在编杂志时常常把旧的东西排斥在外，置之不理，甚至仇视旧的东西，把“人民内部矛盾”搞成了“敌对矛盾”。今天有些朋友仍存偏见，还在形式的新旧上争论不休。我

們不要偏到这方面去，我們應該偏重到政治第一、劳动第一、生活第一方面去，在这个前提下，什么形式都可以。当然，在这个情况下生产出来的形式，很可能是自由詩和旧詩詞进一步的結合。或者平行发展。五四以来的好的新詩，我們要知道，并不是完全脫离了旧詩詞的影响。你在用中国話做詩，中国話本身的規律或韵律，你是不能违背的。

四 怎样估計五四以来的新詩？

五四以来的新詩还是有貢獻的，應該肯定它的成績。如反封建，解放个性，打破束縛，突破了旧詩詞的清規戒律等是應該肯定的。虽然外来的影响很大，但就詩人來分类，也不能一律看待。旧体詩詞和民間歌謠，經過几千年的选择、琢磨、流传，有它的好东西，今后还是有生命的。五四以来的詩歌，虽然受外来的影响，但它总是中国人用中国話写的詩，要守一定的規律，在这个規律里面活动。有些詩是有它存在的价值的，不能对五四以来的东西一概抹煞，我希望有人能够把五四以来的可取的东西选出来。

五四以来的新詩形式注入今天的内容，它可以繼續发展下去，新民歌的形式也会繼續发展下去，这两种形式将来可能会来一个統一，也可能是各有千秋。新詩要垄断是很难的，如果不經常改变，它就会不新了。我們也很

難說新民歌今後一萬年都不會改變。

我個人有這樣的經驗(可能也不僅僅是我個人有這樣的經驗)，就是在大眾的場合朗誦時，舊詩和民歌的体裁不很合適，念起來既吃力而又單調，聽的人也不容易懂。如果是唱或者配上竹板之類的拍打，那才對勁。光是朗誦，不如五四以來的自由詩。這次到朝鮮去，在志願軍總部舉行的一个晚會上，大家要我朗誦我在國慶節寫的那首長詩，我一面念，一面還要解釋，搞了將近一小時，我自己吃力，聽的人也吃力。通過唱或配上竹板的拍打，那多少成為帶有音樂性的東西了，而在大眾的場合完全靠詩歌本身發揮感人的力量，又要使大家都聽得懂，恐怕還是自由詩更適宜一點。這是我的體會。假如我們對這一點也不願肯定的話，未免太偏見了。當然，五四以來的新詩人應該很好的學習新民歌，同時把舊體詩詞琢磨一番，使自己的詩更合乎中國的習慣和更適合中國語言的性質。

對於“五四以來的新詩”這句話，我們應該有分析的來看。五四以來的新詩有各種各樣的新詩，什麼新月派，象徵派，這個派那個派的，我也弄不大清楚。象李金發的詩不知道算什麼派，實在叫人不解，跟胡風的文章一樣。

毫無疑問，我們應該肯定五四運動的精神，要民主，要科學，在政治上表現出了反帝反封建，在文化上表現出了破除舊形式，打倒孔家店，把聖人和一切偶像送進茅坑。這種精神在當時來說還是有它的時代意義的。但在

新詩中有各种各样的派別，各个詩人的成就也不一致。我們應該对五四以来这将近四十年中的可取的东西，作一个总的公平的评价。五四以来的有些新詩，如胡适的“嘗試集”，根本就沒有脱离旧的調子，象告示文似的，不知算什么东西。但不能因此一笔抹煞新詩。比如刚才提到在朗誦时还是非自由詩不行。旧詩在古时有它的朗誦調子，这种調子拖得很长，現在朗誦起来大家会忍不住笑，因为現在和古时的生活习惯不同了。我沒有到农村中去朗誦过，我估計如果到农村中去朗誦，恐怕还是自由詩比較容易听懂，因为它接近口头語言。至于民歌和旧詩詞，前者还比較不那么艰深，后者不但农民听不懂，連我們知識分子也不一定都懂。比如克家解释毛主席的《送瘟神二首》，我觉得就很有些地方值得商榷的。所以我們还是要回到主席的話上来，旧詩詞这个东西，表現得好，特别是巧妙地表現了新的內容，使人深深感到又有紀律又有自由，但要学很困难，要懂不容易，所以“不宜在青年中提倡”。主席这个指示是很宝贵的。当然誰都可以写，不限于我們这些老头子。青年們跃进得快，同时沒有成見，真要認真鑽研的話，也不是就学不会的。最困难的是五四以后成长起来的詩人，因为他已經有他自己的一套，很难鑽进去。

旧詩詞就因为不易懂，因而每每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解释。詩这个东西本来是很难解释的，特别是象征派的詩，那是最难解释的。主席的詩詞当然不是象征派，但主